

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卡斯特《城市问题》析微

Review on the Classic of Marxism Urban Sociology – *The Urban Question* Written by Manuel Castells

牛俊伟
Niu Junwei

摘要：《城市问题》一书是卡斯特的成名之作，它把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应用于城市研究领域，建构了一个以集体消费为主导结构的都市系统模型，进而以集体消费的结构矛盾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第一次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研究方法和参考框架，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应城市问题最初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典型的理论成就，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经典范本。当然，由于结构主义方法的限制，该书在突出主导结构的同时也颠倒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逻辑，无形中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根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理论穿透力。

Abstract: *The Urban Question* is a famous works written by Manuel Castells, in which structuralist Marxism approach is applied to the urban sphere and a model of urban system is constructed o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s a dominant structure, then Marx's theory on the capitalism crisis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s reconstructed by it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establish specific theoretical object, key concepts, research methods and a reference frame for Marxism urban sociology, on behalf of the first and for most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Western Marxism in response to urban problems, and is a model for Marxist-oriented urban questions. Certainly, on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method, it overturns Marx's basic logic on production dominant to consumption with highlighting the dominant structure, and thus removes Marxism revolutionary base virtually, to some extent damages its theoretical penetration.

关键词：卡斯特；《城市问题》；结构马克思主义；集体消费

Keywords: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Structuralist Marxism; Collective Consumption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14JHQ002)

作者：牛俊伟，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niujw123@163.com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1942 年出生于西班牙，1960 年代在法国完成学术训练，1972 年出版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法文，以下简称《城市问题》) 一书，成为与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哈维 (David Harvey) 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的“三剑客”。然而，相较于列斐伏尔和哈维，国内学界对卡斯特的研究并不多，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源于卡斯特自身的思想变化，另一个则和卡斯特研究资料匮乏有关。

1970 年代，以《城市问题》为代表，卡斯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城市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中坚力量。但从 1980 年代开始，以《城市与草根》(1983 年英文版) 一书为标志，卡斯特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立场退却，转而代之多元理论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更加关注各种新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取向、文化认同等主体性和偶然性因素，并最终放弃了城市集体消费的结构矛盾必然导致现有社会结构重大变革的基本结论。而到了 1990 年代以后，卡斯特则又转向技术社会学，并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信息社会理论的首席专家。

卡斯特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截止目前共有专著 19 部，但译成中文的只有 5 部，分别是《信息化城市》、《网络星河》以及“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它们都属于卡斯特后期有关信息和网络社会学的著作，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经典之作《城市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国内对卡斯特后期思想的研究热于对其早期思想的研究，而就早期思想研究来说，则由于资料准备的严重不足，所以基于二手文献的应用性、比较性的研究，多于以一手经典文本为基础的系统化、独立性研究。

就今天中国的现实而言，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空间更新较为普遍，资本逻辑与规划逻辑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以征地农民、动迁居民、利益受损业主为主体，以政府、组织 (开发商、拆迁公司等) 为诉求对象，以争取空间正义为目标的组织化行动已很普遍，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城市问题型”的国家。因此，卡斯特《城市问题》

一书所传递出来的城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对于我们深刻反思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非政治倾向，正确处理日益严峻的城市危机，有重大现实意义。

1 《城市问题》的历史地平与思想背景

19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稳定繁荣之后，开始步入经济衰退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郊区化、大范围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全面陷入危机；大工业城市由于产业外迁和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导致地方政府税源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城市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下降，原先兴旺发达的城市中心逐渐变成了下层阶级和少数族裔聚集的不毛之地；随着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多，犯罪率呈高居不下之势，城市抗议运动和骚乱持续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实际上，这种普遍而严重的城市社会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深刻转型的具体反映，因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化了，而且使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积累和统治的手段，资本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深刻重构，在不断突破其矛盾界限的同时，也把城市塑造成了无限追逐利润的工具性空间，由此必然造成对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强烈挤压和沉重殖民，城市遂成为全球化矛盾最尖锐、最集中的场域，这一切都直接催生了1960—1970年代欧美城市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

如何回应严峻的城市问题，在理论上遭遇着双重的尴尬。一方面，就城市科学本身而言，占据城市研究主流阵地的仍然是20世纪初期即已在美国由芝加哥学派确立起来的古典城市社会学，它用人文生态学的理论范式研究城市现象和城市问题，把城市的本质归结为人性的产物，认为城市生活的变迁趋势类同于生物群落的演变过程，即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过是社会群体在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经过侵入、支配、演替而最终走向均衡状态，以适应城市环境的自然过程。芝加哥学派首次把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开启了现代城市研究的先河，但它把城市主要看作“一个实验室，或诊疗所”^[1]，目的是通过揭示城市变迁以及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实际地解决当时美国众多移民城市中多民族杂处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问题，因而其理论范式实际上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城市问题在理论上的具体反映。然而，进入1960年代，城市问题已然发生重大改变，城市社会并非日益整合、有序，而是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冲突更加严重，社会整合的主题逐渐为社会冲突所代替，芝加哥学派传统理论范式的有效性本身开始成为问题。

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批判好几个世代以来对空间的低估。这种情形是源自柏格森（Bergson），还是更早？空间被当成是死寂的、固著的、非辩证的、僵滞的；相反地，时间则被认为是富饶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2]这种偏好历史（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维度的情形，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人都仅仅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广义上使用的，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要旨的一般历史科学，而往往忽略了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分析基础上对资本积累的空间图绘过程的内在批判，没有看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所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空间理论资源。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被历史化为一般的历史科学时，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意蕴就被长时间地遮蔽了，它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不同的文本中对空间和城市问题有所涉及，但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城市作为一个微观而具体的研究领域，长久以来都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之外，从未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相反却成了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学的牢固阵地。因此，城市社会学一直以来都是一门经验研究传统浓厚的学科，长于实证分析和经验描述，而少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批判精神。20世纪后半叶，当城市和城市问题日益成为时代的一个突出主题时，缺少空间维度和城市话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也存着一种理论范式上的深刻危机。

城市社会危机引燃了城市研究的理论危机，而替代性的城市研究范式首先在法国爆发，“1960年代，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兴起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而这种兴趣特别受到了法国1968年‘五月运动’及其反响的推动”^[3]。1970年，列斐伏尔发表了《城市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两本城市著作，开始把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去理解当代城市问题。紧随其后，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和同事的卡斯特于1972年发表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一书，并立即成为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重磅之作。一方面，卡斯特深刻批判了芝加哥学派，揭示了古典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本质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城市意识形态。对芝加哥学派的批判，尽管列斐伏尔和其他的城市研究者也有所展开，但卡斯特的批判更加严厉而有力，被普遍认为是“攻击得最厉害”^[4]，批判得“最直接”和“最具摧毁性”^[5]。另一方面，卡斯特在该书中重新把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中，注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考察城市问题，力图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相应的阶级冲突对城市过程的根本决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筹划一种新的解放政治学。

从实际效果看,《城市问题》确实全面导引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转向,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引入城市社会学,“确实有助于在城市科学领域中发起革命,创造了一种知识环境使城市社会学每一种理论阐述都隐含涉及马克思的‘幽灵’”^[6],它的出版也被称为是1970年代新城市社会学的“地标”性著作^[7]。受其影响,美国的哈维于1973年发表了《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与《城市问题》一起被并称为“激进的城市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的发射台”^{[4][126]},标志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派的创立。

2《城市问题》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城市问题》一书篇幅巨大,但结构却极其严整,除了一个简短的导言之外,正文共分5大篇18章,卡斯特从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简单勾勒入手,逐步过渡到对主流城市社会学的批判性分析,再以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构了城市结构模型,并以此结构模型对城市政治过程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城市结构与城市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城市危机的表现、根源、实质和意义。

首先,卡斯特粗线条地勾勒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但在他而言,历史的叙述只是一个简单的铺垫或跳板,他要重点强调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形态的深刻变化,即“与一种普遍的天真观念相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的强大,反而造成了城市作为一个围绕某些特定目标组织起来的、制度性的并且相对自治的社会系统的实质上的消失”^[8]。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基本空间形态是以中心商业区为核心,由工业区、工人住宅区、高级住宅区和通勤区从内而外依次延伸开来,呈现为一个与乡村截然不同而且边界清晰、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同心圆,芝加哥最为典型。但20世纪以来,在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连续发生和交错进行的过程中,以洛杉矶为典型代表的多核心大都市区域正在或完全替代了19世纪以来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单核城市模式,形成了包括乡村地区、森林和旅游点、工业园区、高密度住宅区、服务业中心、大型商业中心以及由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复杂网络所穿越的无限延伸的郊区在内的巨型城市绵延区,呈现为一种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郊结合、边界模糊、支离破碎、杂陈无序的新型城市地理景观。卡斯特认为造成这种城市无序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技术,而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逻辑使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利润逻辑不仅夷平了城乡之间的根本差异,而且实质性地消融了城乡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从而使得原先以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乡村社会/城市社会二元分立的传统分析方法失去了效力,城市生态的、政治的、文化的独特性已经丧失,任何用城市文化定义城市空间的做

法都不过是线性历史进化观的陈旧冗余。

其次,卡斯特对主流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理论以及社会实践中流行的城市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在同一个论述中把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相关的空间问题式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殊性的问题式混淆了”^{[8][429]}。一方面,芝加哥学派所谓的“城市性”(urbanism),是用空间的人口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所界定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即居民人格分裂以及人际交往呈现松散、表面和多变。卡斯特认为这实际上是以城市的空间组织形式作为自变量,以城市文化作为因变量,武断认定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不过是以自然决定论的形式把各种城市失范现象归结为单纯的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城市管理专家和技术官僚在实践中就会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巧妙地把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替换为城市环境治理的技术问题以及社会成员适应环境的文化融合问题,进而遮蔽城市问题的阶级冲突本质。另一方面,卡斯特认为列斐伏尔所谓的“城市革命”论,把现代城市的危机归结为由城市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崩解所导致的都市中心性的丧失,武断认定“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9],并以重新激发人类的自由积聚和自主创造的精神以重新回归超越压抑、由瞬间主导的日常生活中心的“空间革命”替代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不过是以文化决定论的形式把城市问题的解决置换成了一种过于浪漫化的艺术想象。如果说芝加哥学派是城市意识形态的右翼版本,那么列斐伏尔则是城市意识形态的左翼版本。二者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空间组织形式与文化价值系统之间寻求因果关联,本质上都把隐藏在城市问题背后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自然与文化冲突的形式遮蔽了。这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理论上,由于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冲突同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分裂,而文化的发展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化过程,它作为普遍的东西呈现给社会的所有成员,主流文化以此彻底掩盖了它的阶级属性;在社会实践层面,城市意识形态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自然化了,因为它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阶级矛盾解释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裂。这种意识形态扭转了这些社会矛盾可能激发的普遍性社会动员的方向,而代之以补偿技术进步所犯的罪恶,而技术进步所犯的罪恶似乎总不可避免,这就在实质上掩盖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现状^{[8][430]}。

再次,卡斯特认为解蔽城市意识形态不能通过简单的道德谴责来完成,需要运用新的理论工具才能实现。因此,“在理论上,我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特别是经由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解读过的马克思的概念应用到城市领域”^{[8]ix},即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他看来,“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

与其他物质要素相联系——这些要素包括牵涉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本身，正是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及相互关联的其他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因此，空间不仅是社会结构布展的某种场面，而且是每个社会在其中被特定化的历史总体的具体表达。”^{[8]115} 因此，空间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也不存在特殊的空间理论，任何空间理论都是一般社会结构理论的特殊部分，空间实质上是特定社会结构的物质性表达，而一定的社会结构总是由经济实例（economic instances）、政治制度实例（politico-institutional instances）和意识形态实例（ideological instances）构成，每一实例又分为一系列的要素和亚要素，在这些实例和要素中总有某种实例或要素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其他实例和要素的特定链接方式，并从整体上建构成一个非平衡的结构系统，可简称为 EPI 结构模型^{[8]125}。在这个模型中，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表现在特定时刻所呈现出来的特殊社会效果，即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势以及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该形式的意义就来自于经由空间所表达出来的社会过程。卡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实例是社会结构的支配性要素，因此经济要素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基础，经济要素与其他实例和要素的特殊链接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效果。城市，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部分，当然也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种实例构成，经济实例具体又可分解为生产、交换和消费三种亚要素；政治实例可定义为“行政”要素，即对经济系统各要素进行规范和控制；而意识形态实例则被定义为符号要素（symbolic elements）所构成的象征系统。这样，整个城市结构是由生产、交换、消费、行政和符号这五种要素和它们的诸多亚要素以某种特殊的结合方式链接而成的特殊矩阵，我们可简称为阿尔都塞—卡斯特城市结构模型^{[8]238-241}。卡斯特进一步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城市结构中居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因为产业资本为了抵抗利润率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大量地扩散到城市以外更广大的地区，而不像在自由竞争阶段仅仅局限于城市内部。与此相反，因为城市有相对集中和便利的生活资料和设施，人口大量向城市汇聚，也就把城市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劳动力“蓄水池”，即消费特别是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日常生活消费越来越主要集中于城市内部。因此，“城市似乎直接意味着与劳动力而不是与生产相关的过程”，城市空间既不是由人口数量也不是生产活动，更不是行政管辖范围抑或文化内容所决定，而是“一个由劳动市场及其相关的日常生活所限定的空间片断”^{[8]236}。更进一步，卡斯特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消费的形式和性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劳动者用工资直接购买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这种传统的消费形式之

外，不经过市场交换而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提供公共物品和消费设施的集体消费形式（collective consumption）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与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挽救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在卡斯特看来，国家或地方政府提供集体消费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既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为私人资本节省了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而使资本积累得以顺利进行。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城市也就成了集体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空间组织形式。既然集体消费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决定性要素，那么集体消费就应该是城市研究的科学对象。

最后，由集体消费所支配的城市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城市实践的矛盾性过程及最终走向。依照结构主义的基本看法，结构是制约事物发展过程的内部机制，而实践则是事物发展的外在表现，结构决定实践，不同的实践取决于事物内在结构的特殊性质。卡斯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与（再）生产它们的集体性特征之间有一个错位”^{[8]269}，即劳动力再生产本质上的私人控制与劳动力再生产客观上的集体性要求之间，或曰消费的集体化与消费的私人控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从根本上决定着城市实践的冲突性过程：一方面，集体消费为资本所需要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方也为大众所需要以改善生活质量，而对于这些集体消费资料，任何私人资本由于无利可图都不愿意也不可能独立兴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地方政府出于劳资双方的共同需求而介入集体消费过程，通过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直接干预公共事业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长期的斗争过程中，集体消费水平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私人资本则出于获取更多利润的现实考虑强烈反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征收过多的税金以支持集体消费。随着集体消费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加大财政支出以满足人民大众福利需求无限膨胀与扩大财政收入的税收政策受到私人资本越来越强烈的抵制之间能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当国家和政府自身的存在受到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威胁难以正常运转之时，国家和各级政府唯一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削减福利开支，而这势必造成集体消费生产和供应的质量和数量的降低。由于集体消费资料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涉及不同城市居民的广阔生活领域，因此，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城市居民有可能超越阶层、阶级、种族、文化的界线，组织成政治团体，为捍卫社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斗争，消费供应危机最终导向自下而上的城市社会运动，而这些运动“能够把源自生产系统和政治斗争中的冲突与其他冲突形式结合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重新开辟革命道路”^{[8]378}。

3 《城市问题》的理论贡献与失误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揭示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表现为私人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根本克服,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不仅使资产阶级的资本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使广大的无产阶级时时面临生存的威胁,当这种威胁不可承受之时,无产阶级就会揭竿而起,并通过革命斗争最终覆灭资本主义。

在《城市问题》一书,卡斯特基本上是循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逻辑建构其城市理论的,所不同的是卡斯特尝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消费的角度去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发达阶段,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在消费领域进一步激化,即消费过程中不断增长的集体性、相互依赖性与私人资本利益对它的控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城市社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阶级矛盾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更多地直接发生在消费领域,阶级斗争已从传统的工厂斗争日益转向新的社区斗争,而且由于集体消费的公共性使得劳资之间的阶级冲突具有了跨阶级的多元性质,因而有可能形成反对资本的社会大联盟。这种社会联盟的形成将会极大地增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潜能,从而有可能使城市再一次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城市问题》实际上是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度改造,以集体消费的结构矛盾在城市领域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逐步从微观的经济领域扩展到较为宏观的政治领域,论证了围绕集体消费问题所展开的城市斗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进一步延伸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整体上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城市版本”,或者说是一个“马克思版”的城市社会学。这一理论版本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范式正面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所面临的重大城市社会危机,第一次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确立起独特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理论方法,有效地弥补了列斐伏尔在开拓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工作方面过于浮躁和含糊、过于抽象和简约的重大缺失,在总体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普遍性参考框

架,代表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最系统、最完整、最典型,因而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成就。该理论成就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城市领域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方法论逻辑和批判性立场,彻底颠覆了传统城市社会学以社会整合为价值取向的理论范式,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科学相结合,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非传统领域话语权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西方左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重新筹划人类解放议程的又一可贵探索,这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入把握当代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城市科学意义重大。

但正如萨维和沃德所言,《城市问题》“存在的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10],它在深刻解蔽城市问题的同时也难免造成某种遮蔽,因而只能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总体而言,尽管卡斯特在颠覆传统城市理论的意识形态本质,重新开启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理论上明显缺陷。就《城市问题》而言,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它试图以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方法,去修正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会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错误,但由于结构主义本身对结构的过分偏好而根本无法完全保证其科学性。

首先,尽管卡斯特着力伸张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向度,并将作为其城市批判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但在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统摄之下,空间仅仅被当成是社会的结构性逻辑的被动的结果和物质性的表现,而忽略了空间作为一种参量和中介渗透到社会运动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并由人的实践活动耦合进社会运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反过来成为创生社会演化图式、模铸社会实践格局、再生产社会整体结构的能动潜能^[11]。这就决定了卡斯特从空间的角度切入对城市问题的分析时,强调的是城市结构而不是城市实践,强调的是人在城市结构中的位置而不是人作为主体的行动能力,强调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要素对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而不是强调空间本身被资本和国家抽象、量化、夷平、分割之后作为获取利润、分化工人反抗、加强社会绝对控制的工具时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就此而言,卡斯特显然没能深刻领会他的老师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一书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变”^[12]的重大意蕴,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的革命价值。当卡斯特深刻地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危机从本质上归结为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消费的社会化与消费供给为私人控制之间的矛盾)时,其实也相对地忽略了一般社会大众、国家和资本三者之间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性和主动创造精神,特别是没有预见到19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所

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凯恩斯—福特主义转而信奉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国家不再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而是采取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福利投资模式,大量引进私人资本并以市场机制的方式将工人福利整合进企业的整体盈利机制内,致力于在政府与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团体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注重为个人提供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并着眼于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原先安全网式的国家福利逐渐为企业工作福利所替代。这种转变并没有因为国家卸脱了公共福利的责任而使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危机,而卡斯特所期望的那种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启新的解放契机的革命风暴却没有成为现实。

其次,在卡斯特的城市政治经济学中,结构主义多元决定论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泛化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在突出主导结构的同时也颠倒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从根本上决定消费的基本逻辑,把资本主义福特制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膨胀为消费的独立决定作用,执拗地用消费政治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政治,这就无形中弱化和稀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之间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等于从根子上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根基,也就注定了这种基于城市结构矛盾基础上的“大众起义”,同样是一个过于浪漫和天真的主观想象,本质上不过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重构了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已。

4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过程虽然晚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在1990年代以来却迅猛发展,大量人口迅速集中于各大城市,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的危机以及由于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所引发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加剧。卡斯特的城市集体消费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如果过多地介入包括住房、交通、文化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往往会导致社会服务供应效率和质量低下,也容易滋生严重的权力腐败,而且极易使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矛盾扩大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冲突,进而挑战政府的合法性和执政权威。但是,如果政府完全把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任由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无序操纵以谋取暴利,甚至在利益面前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利益保护链并压制民众的平等诉求,不但会阻碍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并弱化其抵御世界性金融风险的能力,而且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危及社会稳定。因此,社会公共服务必须在政府提供和市场运作之间进行合理平衡,政府要本着最大程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的宗旨,切实转变政府角色,加大监管力度,从政府经营

转变为政府引导和规制,努力减少城市服务的社会排斥,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当然,消费的不平等问题本身根源于生产的不平等,今天的中国,国际资本、民族资本、政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地绞合在一起,从根本上主导着空间生产的基本轨迹。由于资本的获利本性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出现了“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及与资本利益共谋为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造成对公众的空间权益的多重损害”^[13]。因此,政府如果不能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在利用资本的同时,不去限制资本、批判资本和扬弃资本,就无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也就无法真正化解空间资源占有和消费的矛盾,城市非正义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UPI

参考文献

- [1] 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C].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7.
- [2] 米歇·傅寇.地理学问题[C]//夏铸九,王志弘,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2002:392.
- [3] Pickvance C.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C].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1976: 1-2.
- [4] Edward W Soja. 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29.
- [5] Gottdiener M.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114.
- [6] Flanagan W. Contemporary Urban Sociology[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86.
- [7] Katznelson I. Marxism and the C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7-38.
- [8]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M]. Sheridan Alan, Trans.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7: 14.
- [9]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C].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3.
- [10] Savage Mike, Warde Alan. 都市社会学[M].孙清山,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34.
- [11] 牛俊伟.论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对现代社会的时空诊断[J].山东社会科学,2012(3):29.
- [1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Nicholson-Smith Donald,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91: 20.
- [13] 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6(5):1.

(本文编辑:张祎娴)